

2009译学词典 与翻译研究文萃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2009 Symposium
on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 Translation Studies

主编 孙迎春

2009译学词典 与翻译研究文萃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2009 Symposium
on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 Translation Studies

主编 孙迎春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译学词典与翻译研究文萃/孙迎春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46-2197-7

I. ①2… II. ①孙… III. ①翻译理论—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72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197-7 / Z · 0048

定 价: 4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2009年11月20—23日,第五届全国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黄海之滨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会议收到论文69篇,遴选其中的27篇编辑成册,付梓面世。

翻译学词典的问世是翻译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译典编研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有必要对这段历程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并对其发展前景予以瞻望。

1. 译典编纂高潮

大家知道,在1997至1999这三年出版了四部有影响的译学词典,中国的两部是《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主编,1997)和《译学大词典》(孙迎春主编,1999);外国的两部是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主编,1997) 和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ona Baker 主编,1998)。

杨自俭先生指出:“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两个问题,一是中西方在译学建设上距离不是太远,都已发展到开始关注本学科术语的研究;二是更进一步证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完全成了不争的事实”(方梦之,2004:序)。从这句话我们看到:第一,术语是翻译学和译学词典的核心;第二,译学词典是标志性成果,它是翻译学发展迅速与其独立学科确立的明确标志。

这段时间堪称世界译典编纂的高潮,东西方各出两部,又适逢世纪之末,就像一年的除夕。

如果把四部译典看作译典编纂的高潮,那么在此之前必须有几部译典出来,要不怎么会有高潮呢?据现有资料,国内第一部译学词典是《中国翻译家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等建组集体编写,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计90万字,收录翻译家1,124人,其中古代180人,现代944人。而后出版的译典包括《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林煌天、贺崇寅主编,1991,上海翻译出版公司)、《英汉·汉英翻译学词汇》(陈善伟编,199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 (汉英英汉译事百科,Chan Sinwai & D. Polard ed., 199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最后一部词典2001年又推出了第二版。据现有资料,这是国内外第一部有分量的译学百科全书,以英文撰写,涉及汉英两个语种,理论与实践并重。

世纪之交,在翻译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译学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接踵面世了多种译典,其中包括:《英汉翻译例句词典》(刘重德,1999,湖南文艺出版社)、《英汉对照描写辞典》(贾卫国,200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词典》(马珂、孙承唐,2001,陕西教育出版社)、《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孙迎春,2001,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2009年出版的有: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翻译技术词典,陈善伟,200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翻译研究关键词》(孙艺风、仲伟合编译, Jean Delisle、Hannelore Lee-Jahnke、Monique C. Cormier 原著,200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译学辞典》(方梦之,200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史企曾,2006,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与云南人民出版社)、*A Chronolog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Legendary Period to 2004* (中西翻译编年史,陈善伟,200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译学词典编研领域的开拓

译学词典研究从无到有,至今已有了八个年头,该做一些总结了。

其足迹显示,译典研究正走在一条译典批评—理论根究的探索之路上,并将继续沿着建立译典理论与译典学科的征程继续前行。

词典批评是译学词典研究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形式,译典问世之后,批评就散见于翻译研究或综合性社科杂志上。从批评主体和批评性质来看,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表层印象式批评,批评人为普通读者,体现为从使用角度出发进行的总体性或散点式评说;第二种是译学词典专家从翻译学与词典学相结合的交叉视角做出的学术性批评。现有的译学词典批评多属前者,如刘重德的《翻译工作者的伴侣——评〈中国翻译词典〉》(出版科学,1998,(1)),罗选民的《评介〈英汉翻译例句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2))等。第二种批评,即译学词典专家学术性批评,有赖于严肃的译学词典批评理论,其核心是评价标准。黄希玲的《〈翻译学百科全书〉简评》(山东外语教学,2003,(4))以及《上海翻译(2005)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所刊载的两篇译典批评文章——曾东京的《〈中国翻译词典〉得失论》和卜爱萍、曾东京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的特色与不足》,应当说是最早的学术性批评。

“关于译学词典较为严肃的理论探讨,最早见于孙迎春《论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一期)。文章认为,译学词典的出现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并结合《译学大词典》的编纂实践,提出译学词典编纂的五项基本原则:描写性、综合性、理论性、实用性、开放性。最后讨论了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中的实际问题,涉及正文编排、编纂宗旨、读者对象、附

录设置以及释义方式”(赵巍,2006)。

2001年4月21—23日到青岛参加“全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笔者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发表于2002年第3期《山东外语教学》。

2002年6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翻译理论高层论坛”上,笔者以“论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为题发言,而后同名论文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同年第9期。

2002年9月20—23日,经过笔者的策划与推动,在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译协主办,山东省译协、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外语系、烟台师院外语系共同承办的“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师院召开。这是第一届以译学词典研究为主要议题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推出的《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是第一部以译学词典研究为主要议题的论文集,孙迎春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会上的三个主题报告,其中有两个随后正式公开发表:《论翻译工具书的研编》(王克非,中国翻译,2003,(4));《译学词典类型初议》(孙迎春,中国翻译,2003,(5))。

2004—2005年有三篇译典硕士论文通过了答辩,为而后更高层次的博士生译典研究与译典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做了铺垫。赵巍博士对此简述如下:

2005年国内第一篇译学词典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黄希玲博士的《论译学词典的研编》(*On Compiling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通过论文答辩。该论文以译学词典的编纂实践为依托,运用自然科学理论探讨了专科词典的编纂原则,提出面向对象原则、就近访问原则和系统原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译学词典编纂的全部,丰富了专科词典编纂理论。由于双语词典学倾向于把翻译仅当作一种手段,在词典学界一直有翻译学是词典学分支的说法(Hartman, 2001: 123)。该论文改变了这一观念,成为译学词典研究进入国内辞书界的标志,为翻译学向外围学科拓展

做出了贡献。(赵巍,2006:178)

而后,2004年10月15—17日,“2004全国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就“译学词典的词条及其释义”作了主题发言,该会后在《中国翻译》正式发表(张柏然、韩江洪:2005,(2))。会议文集《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5年10月21—23日,“第三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论文集以《〈上海翻译〉2005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专辑》的形式出版,集中展示了2004—2005年译学词典研究及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

继黄希玲之后,有三篇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赵巍的《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2006)、范敏的《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译学词典研究》(2008)以及高雷的《译学词典的本体论研究》(2010)。

2006—2007年,文军教授以极大的魄力和实力主编了一套译学资料性参考书,包括2006年两部——《中国翻译教学五十年回眸》、《中国翻译批评百年回眸》——和2007年三部——《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中国翻译技巧百年回眸》、《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

2007年4月,曾东京教授的《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单独印行的翻译学词典专著。

2007年4月19—22日“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会议论文集2008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维波、耿智主编。

2009年3月范敏博士的《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译学词典研究》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进行系统性译典研究的力作。

同年8月曾东京《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的英文版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Translatology Dictionaries* 由上

海大学出版社出版,邵庆华、商晓芳、曾东京翻译,这一研究有望对译典研究在国际上发展做出贡献。

同年9月笔者的《译学词典论》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词典研究项目成果。

3. 历史的启示

翻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 and 翻译学之间的关系,与翻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相类。其发展也会遇到重重的阻力,因为母学科的普遍心理可能会有并不明言却可察觉的抵触成分。一种人会觉得:搞什么译学词典,翻译研究没有译学词典的日子不是很好吗?我做研究时从未产生过要查它的愿望;第二种人可能会想:建立翻译学科需要一个具有单一性、封闭性的理论和术语体系,但这只有天才的理论家才能解决,眼帘之内的译学词典编纂者均无此能耐;第三种人好得多了,他们认为既然翻译学要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从完整性出发,翻译学词典是有必要的,发几篇文章做点研究也可以,但没有太大发展,怎么可能建成一个学术领域呢?

2004年11月初,在中国译协第5届理事会上,宋书生会长代表中国译协第4届理事会做了题为“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开创译协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其工作回顾的第一部分为“翻译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他谈到各类翻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和翻译讲座等学术研讨活动的特点时,总结了三点:“一是参加人数较多,社会影响较大;二是这类研讨会具有较浓厚的翻译学术气氛,会上发表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三是论文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涵盖了外事、科技、社科、文学艺术、民族语文、对外传播、经贸、法律、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翻译服务、词典编纂、翻译软件和机器翻译等领域。这些学术会议构成全国翻译学术研讨活动的主流,带动并促进了翻译学术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译界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在增强,翻译学作为一门日趋成熟和发展的独立的人文社会学科,正逐步成

为译界的共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是应当感到庆幸的,因为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从无到有,踏上其荣耀而艰辛的路程并不算很久,却已经得到了译界上层的关注。

《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刊登了中国译协的一则启示,要在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成立两个全国性翻译研究资料中心。这说明,随着翻译学的发展,文献学意识正逐渐成为译界的共识。资料积累多了,必然要搞些索引以利查询,发表出来即是译典之一种。

再联系前几年的情形考虑一下,就会得到更多的启示。Mark Shuttleworth 的《翻译学词典》2004年由上海引入原版,2005年北京又出版了她的译本,然在此之前《中国翻译》就发表了两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一篇是张旭的《关于翻译研究术语汉译的讨论》,刊载在第4期;另一篇是谭载喜的《翻译研究词典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刊载在第6期。这种情形在其他领域大概是罕见的吧。这说明,译界对于规范的术语及其体系充满了渴望。

最值得欢欣的是,适值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之际,2008年8月4—7日,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口笔译工作者、研究者和业界有关人士汇聚一堂,围绕大会主题“翻译与多元文化”,就业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这是50年来世界翻译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行,也是中国翻译界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国际翻译界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绝佳平台。在“翻译与文化”、“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与培训”、“翻译服务与翻译技术”等12项大会主要议题中,第9项是“术语研究与译学词典研究”。这应当是本研究领域在世界翻译大会上的首次亮相,无疑是值得本领域开拓者和学者骄傲的事情。8月6日下午的“词典编撰”分论坛,在意大利学者 Rosanna Masiola Rosini 女士的主持下,有三位学者先后发言,发言人及发言题目分别是:

(1) Sun Yingchun (China) — “On the Structure of Compilation

and Study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孙迎春[中国]——论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的结构);(2) Anna Šebestová (Slovakia) — “Processing of Terminology in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Slovak Language” (DCSL)(安娜·瑟勃斯托夫[斯洛伐克]——《当代斯拉夫语词典》的术语处理);(3) Gao Lei (China) — “On the Ont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高雷[中国]——译学词典的本体论研究)。三位发言人发言结束后,与会的各国学者饶有兴趣地向发言人进行了提问,发言人和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探讨。在大会发行的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光盘版论文集中,还包括如下学者的相关文章:Zeng Dongjing & Wu Chunlan (China) — “On Descriptivism and Prescriptivism of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曾东京、吴春兰[中国]——关于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与规定性);Jiang Xia, Xu Luzhi — “On the Corpora-based General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基于数据库的综合性译学词典);赵巍——“关于传统译学术语系统”;史企曾——“创新之路:《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袁朝云——“基于信息论的译学词典编纂”;范敏、孙迎春——“篇章语言学观照下的译学词典研究”;孟臻——“译学词典与翻译教学”。翻译学词典研究从此迈出国门,走向世界。随后,由高雷、孙迎春撰写的长篇英语论文“Ont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ies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译典研究的本体论视角)在2009年第1期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美国翻译学刊)发表。

那么,译典编研的简短历史给予人们什么启示,我们下一步又应如何去做呢?以史为鉴,我们可获得如下启示:

(1) 译典编纂与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翻译学子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知和承认。

(2) 译典编研已经并将继续为翻译学向外国学科拓展做出贡献。

(3) 在译典编研领域,中国人先走了一步,编纂方面是这样,理论研究方面则更是独树一帜。总是跟在西人后面,走一条学习、消化、吸收、草创的道路,而不是勇于突破与创新,那不是我们的风格。

关于今后的译学词典编纂及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如下几条想法:

(1) 继续增强译学词典意识。经过最近五六年的努力,翻译界和词典界已对译学词典有了一些认识,但多数情况下仍停留在感觉、知觉、表象这些感性认识阶段,能够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对其进行理性认识的人还少之又少。如果人们译学词典意识不增强,便认识不到译学词典的功用和价值,便没有足够多的学者投入到译学词典的编纂和研究中来,现有的译学词典尚且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又何谈进一步的发展呢?因而译学词典意识要进一步增强,这是首要的一步。

(2) 加强理论研究,将词典学一般理论与译学词典编纂的实际相结合,在看到共性的同时研究归纳出译学词典编纂的特殊规律和具体方法,再用五六年时间,撰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几部新的具有哲学深度的译学词典专著,产生不同的学派,展开争鸣,推动学科发展,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体系。我国在译典研究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我们要通过拓展、加深理论研究,继续保持这种领先的特色,并敞开大门,走出去,迎进来,让译典研究在国际上开花结果,使之具有国际性。

(3) 增大词典编纂的力度,对已有类型,在深入研究、搞清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品种,丰富我们的词典宝库;对暂缺类型,要分别轻重缓急、长线短线,根据译学读者的实际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必然,逐一填补空白。这就是说,译学词典的编纂,要实现系列化,因为任何一部词典,即使是超大型的词典,也不可能包罗万象,一应俱全。出路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的词典体系,即根据不同的宗旨、对象、语种、功能编出不同类型的词典,配套成龙,形成系

统。“多它一种多余,少它一种不缺的词典,还是少出版为好。梅谢里亚科夫的意见是对的:‘在着手编写词典之前,要想一想这部词典在词典体系中将占有什么位置’”(黄建华、陈楚祥,2003)。有地位、有特色、有分量、功能强的译典,每增加一部,都值得额手称庆,因为它为译典编研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完全可以预见,虽仍存在种种困难,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们决计会克服一个个困难,促使译典编研这个新的学域不断汲取各种营养,从而渐渐成熟,并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孙迎春

2010年1月30日于

威海玛珈山麓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译学词典[Z].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 黄建华、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赵巍. 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A]. 孙迎春. 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C].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

目 录

翻译学词典研究

试论译学词典的附录设置原则	杜 晓(3)
译学词典中的术语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范 敏(12)
论译学词典的编排	冯春波(24)
论译学词典的批评规范	高 雷(33)
翻译学与词典学研究相结合的力作——简评《翻译学 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	高媛媛(43)
汉译外实践中的平行语料库解决方案	管新潮(52)
译学词典之于翻译教学	蒋 侠 孙迎春(64)
国内译学词典研究: 回顾与展望	蔺志渊(76)
论译学词典的译介——以 <i>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i> 及其中译本为例	刘爱华 孙迎春(86)
浅析功能主义视角下译学词典的交际功能	刘会然(94)
译学词典编纂理论发展现状研究	刘立胜(100)
译典价值与评价	孙迎春(110)
再论翻译学词典的规定性	曾东京 朱惠芳(124)

翻译理论研究

略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与变译理论的异同	卞建华(139)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周作人的直译翻译理论	孟令娟(150)

2009 译学词典与翻译研究文萃

- 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研究 任东升 杨娜(159)
- 论汉英语篇翻译句法层面的元语用意识
——以英语复杂简单句应用分析为例 王晓农(173)
- 从中西译学发展对比中得到的思考 余静 殷燕(183)
- 再论译者的文化责任 张建惠(191)
- 翻译中的模糊性与灵感型思维——翻译是创作,
翻译靠积淀,翻译唤美育 张文静(199)
- 译者创造性的反思 周丹 殷燕(207)
- 作者意图与译者目的的博弈辨析 周兴华(215)

翻译技巧研究

- 《天路历程》与《圣经》平行翻译进程研究 焦良欣(223)
- 从《锦瑟》英译看中诗英译理想译者类型
..... 李莹莹 缪经(231)
- 政论文体双向平行语篇连接衔接手段的对比及其翻译
..... 于强福(240)
- 从最佳关联性看广告翻译中的语篇重构 章静(253)

翻译教学研究

- 翻译教学在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中的应用 何大顺(263)



翻译学词典研究

试论译学词典的附录设置原则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Appendix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ictionaries

杜 晓

摘 要: 本文从附录的定义与作用入手探讨译学词典的附录设置原则,进而评论了《中国翻译词典》等几本译学词典的附录设置。本文作者认为,译学词典附录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相关性原则;必要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关键词: 译学词典;附录;设置原则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appendix,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appendix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n comments on several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ree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appendix are presented: being relevant, being necessary, and being moderate.

Key words: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ppendix; compiling principles

1. 引言

陈炳超(1991)认为,中国辞书设置附录,最早见于梁顾野王《玉篇》、唐孙强增字减注本(公元674年)中所加的“反纽图”。这一设置开创了后来辞书应用附录辨析字形的风气。虽然辞书中设置附录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但辞书普遍设置附录却是近几十年的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辞书事业迅速发展,各种词典不断涌现,辞书附录的设置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许建业(1995)对精选的1,600多种馆藏辞书的统计,共收录附录6,400多种,平均每种辞书4种附录,多者达50种附录。